

哲學雜誌

《季刊·第18期》1996年11月出版

主題論述

哲學與政治的辯證

跨世紀政治哲學的論題
當前政治倫理的重建
市民社會與保護式的民主
論人類之合理性
民主的弔詭
周易政治哲學芻議

18

哲學雜誌

《季刊・第18期》

發行人兼社長——陳春雄

總編輯——沈清松

編輯——傅佩榮

主編——伍至學

執行編輯——劉振維

社址——台北市中華路二段133巷6號2樓

電話：(02)33043152(代表號)

傳真：(02)33043153

郵撥：074381219 業強出版社

發行所——聯合發行中心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二樓

電話：(02)2283565(代表號)

傳真：(02)2283619

排版——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仲一彩色印刷公司

出版登記——局版台誌字第949九號

定價——新台幣二〇〇元整

全年四期八百元整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哲學雜誌

《季刊・第18期》1996年11月出版

主題論述

哲學與政治的辯證

跨世紀政治哲學的論題

當前政治倫理的重建

市民社會與保護式的民主

論人類之合理性

民主的弔詭

周易政治哲學芻議

18

哲學雜誌 第十八期 【目錄】

●主題論述●哲學與政治的辯證

跨世紀政治哲學的論題

當前政治倫理的重建

——失序與調適

市民社會與保護式的民主

論人類之合理性

——哈伯瑪斯之共識理論

民主的弔詭

——對臺灣邁向民主化的省思

周易政治哲學芻議

洪鍾德 004

林火旺 030

石元康 058

陳文團 072

黃 薈 104

李雲生 122

● 一般論文 ●

資訊科技的哲學省思

柏拉圖對話錄各篇大意

略論中國哲學字詞的意義結構

愛與存有

——與馬塞爾懇談

資本的創世紀

——論《資本論》的起頭

柏拉圖《狄梅鳩篇》與《易·繫辭傳》的比較

● 書評 ●

《神的歷史》(Karen Armstrong 著, 蔡昌雄 譯)

《意向性》(John Searle 著)

● 廣告索引 ●

立緒文化

業強出版社

哲學雜誌

沈清松 134

傅佩榮 156

李幼蒸 182

關永中 190

孫善豪 206

魏德驥 222

傅佩榮 240

陳瑞麟 246

189

205

221

跨世紀政治哲學的論題

一、政治哲學的特質

二十世紀是人類有史以來變化最繁劇、影響幾乎擴及全球、而事件又層出不窮，也即是一個危疑震撼的世紀。尤其是世紀抄的最後十年，人們目擊蘇維埃紅色帝國的崩潰、東歐共產勢力的沒落；中國、韓、越共黨執政國家倡導經改開放，企圖以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來鞏固共產一黨的專政；第三世界的人民在與貧窮、疾病、天災、內戰搏鬥之後，勉強掙扎於生存與尊嚴之間。整個世界在擾攘紛爭中並未步入後冷戰時代的和平、穩定、安全等大衆所企盼的新秩序裡。反之，二十一世紀卻以「不定」(uncertainty)的面目與身影，直逼人類、硬性闖入人間，使跨世紀的人類益增惶惑、益感疑懼。究竟人類何去何從？人們在跨世紀的門檻上徬徨踟躕，有無出路？有無希望？

向來的哲學家雖然沒有本事改變世界，但至少還得繼續解釋世界、指引世界。這種說法雖然違背

了馬克思的教訓，但卻是東西傳統哲學家一貫的想法與做法。因之，處在跨世紀的人們，仍有待哲學家，特別是政治哲學家，來解開迷津，引導大家安渡到二十一世紀的彼岸。這樣說，雖然未免太抬舉政治哲學家，但卻也是時勢所逼出來的必然結果。誠如黑格爾所說，哲學是一個時代的反思，也是以思想、理論來理解該時代的不二法門。因之，關懷與理解跨世紀的地球及其住民之命運，固然要靠一般哲學，對其典章制度的變化調適，尤賴政治哲學的剖析與解讀。

什麼是政治哲學呢？它與其他學科有何不同呢？顧名思義，政治哲學是探究政治生活的本質和意義之根本學問。它有異於政治科學，不以政治現象的經驗事實和歷史實況作描述、分析和預測的對象，俾建立客觀現象的法則。反之，政治哲學在探究政治生活的真理，討論何種政治生活是美好的、完善的，何種政治實體（國家、社羣、社會、團體、個人等等）是可欲的、值得建立的。換言之，它致力於討論在何種政治實體中能夠實現「公共之善」（*bonum commune; public good*），而滿足大多數成員公共生活的需求，實現公衆道德的理想。它涉及規範與價值的學問。因之，本質上為有異於科學之事實分析，而為規範的理論，或是涉及價值判斷的學說。

與政治哲學相關連的學科，除了政治科學之外，尚有政治思想、政治理論、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政治人類學等等。一般而言，政治思想係指過去偉大的思想家，或政治實踐者，有關其所處時代與國家的政治主張、或政治現象的剖析，是傳統政治哲學的源泉。因之，一部政治思想史也是一部政治哲學史。政治哲學為個別政治思想家學說的綜合，也是他們所演繹的概念、理論的綜合分析。

政治哲學與政治理論也常混同使用。近期中有人把政治理論視為政治哲學、政治科學與政治意識形態三者之綜合（Hacker 1961: 1-20）。不過多數學者傾向於視政治理論為經驗性政治事實之探究所形成的系統化、概括化（Sheldon 1988: 1-2）。但少數學者卻視政治理論為政治哲學的別名、或

代替(Fowler and Orenstein, 1985: 4)。①

至於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政治人類學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一九六〇年代以北美、西歐為主的政治科學界新興的政治行為研究，其關懷的對象為政治人(political man)，及其行為之研究。它是對傳統政治學以典章制度，以國家、政府為核心的制度研究之抗議與反彈。這類行為科學的研究方式基本上排斥政治哲學，視政治哲學為混淆事實與價值，為一種思辨(speculative)、或形而上學(metaphysical)的政治研究，與科學的客觀、價值中立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背道而馳。不過這種研究政治的行為的考察，不久之後就被所謂的「後行為主義的革命」(post-behavioral revolution)所推翻，儘管它在英美的政治學界一度享有主流的地位(洪謙德，1976: 28ff.)。

政治哲學主要的三個面相為：第一，探討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概念，並對這些概念加以省思冥想；第二，尋找政治生活各種可能性替代的觀點，不以過去的和現存的觀點與想法為思考的唯一對象；第三，政治生活中的道德意涵，研討政治倫理實現的可能性，以及致力政治真理的顯露。

傳統上，政治哲學所討論的議題，不外視政治生活為個人與羣體道德生活與倫理生活的延長與擴大。因之，不管是東方聖人孔夫子所主張的成己成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訓，還是西哲蘇格拉底的學說，視道德即知識，理解自己，俾發揮潛能，而促成個人在社會階梯上適才適用而發揮其所長。這些都說明古典的政治哲學是把倫理和政治視為一體之兩面，或一個連續體(continuum)的兩端。這是人類的政治生活，無法與政治倫理徹底分開的原因。就今日的政治哲學來觀察，倫理與公共生活的緊密關係仍無減緩的迹象。因之，政治哲學裡的基本問題仍舊圍繞著美好的公共生活(bonum commune)在打轉。

因此，什麼是公共之善(public good)，在政治生活中人們追求什麼目標？這些公共目標、公

共價值之間的衝突、矛盾怎樣來加以解決、折衷、平衡？個人與社羣（國家、社會、政府、族羣、團體）之間的權利義務如何釐清？如何區分、如何信守？公權力與個人的自由之分際怎樣澄清？這些都成為向來的政治哲學之課題。換言之，政治哲學討論政治價值（自由、平等、公義、利益、權利、義務等）、政治資源（權力、財富、職位、聲名、勢力等）、政治設施（機制、人事、制度、律則、傳統、先例、慣習等）、政治互動（競爭、聯合、權鬥、宰制、順服等）之間的搭配。除了考察實然面，也兼討論應然面，俾為人類美好的公共生活指陳理想之所在。這種理想性的強調，也使政治哲學有異於政治科學，並不走烏托邦（out of Utopia），而勿寧是返回烏托邦（return to Utopia）。

自從本世紀初以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為首的語言結構學說興起以來，社會科學界所理解的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既不再是馬克思所倡說的社會經濟形構（socio-economic formation），而為拉克勞（Ernesto Laclau）所指稱的符號學的形構（semiotic formation）（洪謙德，1996：59-64, 97-119）。涉及政治現象的概念、詞謂，也跟著變成了政治言說（political discourse）。

在這種情況下，上面所提及的政治價值、政治資源、政治設施、政治互動之基本概念，也不過是政治語言（language of politics）的一些名詞（terms）而已。換言之，政治哲學要處理的對象，不再是政治實在、或政治現象的剖析，而勿寧是政治語言、政治名詞、政治言說的解讀和析義。

那麼政治語言中的名詞有何特質呢？其特質是從政治語言當成人們溝通工具衍生而來的。政治語言並不是一種中立的媒介或溝通工具，它要傳達的理念並非獨立形成的。政治語言是一套具有價值取向的意義體系，這個體系業已靠著制度而形成結構。換言之，政治語言是意義的制度化結構（an institutionalized structure of meanings）。依賴著這種意義的結構，人們才會把其政治思想與政治行

爲朝一定的方向匯聚流動（Connolly 1993：1）。換言之，政治哲學中所討論的概念是受時空情境的影響，它們是隨著情勢的變化，而改變其涵義。

在這一理解下，當代政治哲學雖然也在討論自由、平等、正義、權力、利益等傳統上政治語言的名詞，但卻必須以舊瓶裝新酒的做法，重新界定與辨識這些名詞嶄新的涵義。

由於新的政治、社經形勢的產生，加上政治名詞、政治概念新涵義的浮現，使跨世紀的政治哲學必然面對不少新的議題、或論題（issues）。

當代政治哲學所面對嚴肅的問題之一爲蘇東波變天之後，隨著共產主義在俄羅斯與東歐的沒落，是不是意味著一百五十年來激烈追求人類平等理想的社會主義也跟著走下坡？作爲社會主義主流的馬克思主義是否也變成明日黃花（Gray and Alexeeva 1994）？與此當時，政治理論家也面對另一個難題，那是指難道社會主義的式微，就代表資本主義的勝利？難道資本主義真的席捲全球？當代資本主義真的所向披靡無堅不摧？在對抗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沒落之後，有沒有取代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可供人類選擇？再說，隨著極權的共產集團之崩解，是否意味著西式的自由民主之勝利？相對於西式的民主新興工業國家所倡導的有效率的政府，是不是在尊重人權方面略遜英美？民主體制是否應該以美歐馬首是瞻？

二、社會主義的衰微與再生

過去一百五十年間，以歐洲大陸爲舞台，社會主義曾經扮演著抗議與制衡資本主義急先鋒的角色，其出發點在於詛咒與撻伐資本主義擴大利潤的貪婪，特別是資本家對直接投入生產行列的廣大勞工之剝削與壓榨，而造成社會的不公與不義。因之，儘管這個反對與抗爭運動的陣營十分複雜，但社會

主義的主旨仍舊在於消除個人對生產資料與工具的私自擁有，而讓生產資源控制在公眾的手中，透過公共機構來進行有計畫的經濟活動，俾人們的需求獲得較為公平與妥善的滿足。由於公有制遂取代私有制成為消除貧富差距、抑制盲目追求利潤的手段，也是最終導致個人的利益與社羣的利益融為一體的方法。

可是社會主義這套良法美意，卻隨著本世紀初布爾塞維克在俄國的奪權勝利，而成為絕響，蓋俄共把社會主義引入國家社會主義的歧途。代替人們夢寐以求的無階級、無壓榨、無剝削社會的出現，卻是共黨一黨專政，以及黨團官僚所形成的新階級的崛起。加上史達林的大權獨攬、個人崇拜、整肅異己、和種族殺戮，使社會主義原來的理想被徹底抹黑塗污。

不僅在俄國，就是受舊蘇聯紅軍踐踏的東歐，或是奉馬、恩、列、史之學說為主桌的中國、韓、越、古巴等等，都紛紛披上社會主義的羊皮，而販賣共黨獨裁專政的狗肉，這是世人何以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轉趨絕望的原因。

誠如羅默（John E. Roemer）所言，假使把社會主義等同為蘇聯模式的制度與施行的意識形態，那麼隨著東歐與舊蘇聯的變天，這種社會主義的制度與理想可謂徹底的敗亡。但是如果把社會主義的前景看做市場的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則社會主義不但並未



●社會主義的良法美意，因俄共把其引入國家社會主義的歧途而成為絕響。（圖為蘇聯時代的紅場）

衰敗，反而大有可為（Roemer, 1994a and 1994b: 451ff.）。

回顧過去這一個半世紀間社會主義的崛起、發展、演變和衰落之歷史，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是針對資本主義制度而產生的激烈要求，也即要求徹底的平等。而徹底的平等之實現有賴依靠國家的力量把生產工具的擁有從私人的手中，轉移到公家的組織裡，從而杜絕資本主義貪婪的、無止境的利潤追求與不當的榨取。換言之，社會主義最高的目標在滿足絕大多數人們的需求。這種社會主義所高懸的理想目標，卻因為從前的共產集團國家之計劃經濟與統制經濟的失敗，而成為幻想或奇想。另一方面，致力推動民主社會主義的西歐或北歐諸國家，則不認為俄式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便意味著社會主義毫無前途可言。對它們而言，另一種形式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只是把徹底的民主延伸到經濟領域中，而非以官僚組織來控制生產。

像舊蘇聯以共黨官僚所控制的生產、轉運和分配活動而形成的權威性國家社會主義（authoritarian state socialism），其在運作上的失敗可以簡單歸結為幾個原因。首先，布爾塞維克黨人誤解以國家的財產來取代私人財產便可以結束資本主義的生命，但其作法卻產生相反的結果，也即導致個人創意與經營才能的喪失，以及造成整個經濟活動的活力與效率之下降。

要之，導致蘇維埃式經濟失敗的主要原因為下列三種因素，以及這三種因素的拼合：（1）大部分貨品的分配，是由行政機關去操作，以致貨品的生產者不必彼此競爭，這就是俗稱吃大鍋飯，人人缺乏鬥志活力的原因；（2）政治單位（共黨）對經營實體（工廠、農場，以及其他各種生產、運輸、分配、配給的單位）之直接控制，造成經營實體效率不彰；（3）政治上不標榜多元民主、不崇尚競爭異議，遂導致領導之大權獨攬，以及政治生活的死氣沈沈（Roemer, 1994b: 457）。

羅默認為只瞭解上面三種因素，以及其綜合，並不能理解蘇聯模式經濟失敗的真正原因。反之，

吾人必須理解上述三種因素運作的機制（mechanism）。這便涉及所謂主要行動者的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Roemer, 1992: 261-276）。所謂的主要的行動者問題可簡化為下列三種關係：（1）工廠和集體農場中管理人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2）計劃者與管理人之間的關係；（3）計劃者與一般公眾之間的關係。按照計劃經濟的構想，管理人必須讓工人執行生產計劃，計劃者必須指令管理人實施官僚所制定的計劃，計劃者必須盡其所能來滿足公眾的需求。要之，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所有官員與人民都可以簡單區分成上述三種代理人：計劃者（領導）、管理人（官僚）與勞動者（人民）。

布爾塞維克黨人與毛派人士最先天真的想法是認為不需藉搞賞、或其他誘因，只要略施讚美或公開表揚，人們便會奮力工作為國家效命、「為人民服務」。可是這種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新人類」並未誕生。就算他們一度誕生也很快便告夭折。原因是期待社會主義新人類作一時的犧牲，在短期間或尚能辦到，要求他們終身只為一個空洞的口號或理想硬拼是絕無可能，因為畢竟他們是凡人，而凡人必定要多少照顧本身的利益。

因之，上述三種主要代理人之間的關係所滋生的問題，在號稱廣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必然一一浮現的。例如工人與管理人之間的關係最先便要發生磨擦。管理人為了推行計劃者交代的指令，必然要求工人奮力工作。可是只靠「模範工人」的虛譽，而不給予實質的搞賞（升遷、獎金、花紅、假日、其他補貼），也不以解職來懲處其怠工，則一般工人怎樣會提昇其工作意願，提高其生產效率？

至於管理人與計劃者（政治領導人）的關係，也由於計劃者的收入是倚靠其轄區的生產單位所提供，由是計劃者必須與管理人相互妥協與勾結，否則生產一旦降低，計劃者必然顏面盡失，職位也不保。於是這兩者的關係，表現在「軟弱的預算限制」（soft budget constraint）之上。也即計劃者儘量提供生產單位以資金貸款、或減稅便利，目的在使那些本該關門的生產單位勉強維持下去，否則生

產單位一旦關門倒閉，衆多的勞工要遭驅遣失業的命運，而在共黨統治下的國度是不容許失業之存在。

至於計劃者（官署、黨部）與公衆的關係，實施社會主義的國家，是靠共黨以人民的先鋒之角色、或是毛派份子所主張「來自羣衆回到羣衆」的響亮口號，表面上加以處理，但列寧、史達林與毛澤東犯了一大錯誤，他們都忽視人類追求自利的本性，是根深蒂固無法拔除。更何況要使政治不斷更新，有賴競爭，但要競爭有效，應該讓公衆擁有參政的權利。任何一黨專政，少數人掌握國家權力，都會使羣衆成爲政治的旁觀者與陌生人，其結果是計劃者（政府、共黨）的施政無法真正以民意爲依歸，更不容民意的干涉監督。這就完全喪失社會主義實現全民需要的原意與理想（Roemer, 1994b, 458）。

爲了使蘇東波變天之後的社會主義不致與俄式的共產主義玉石俱焚，於是羅默重振一九三〇年代郎額（Oskar Lange 1904-）所提的市場社會主義之雄風，爲社會主義注入再生的新血液。他的努力就是一九九四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所刊印的《社會主義的一個前途》（Roemer 1994a）一書。該書出版不及半年引起美國新左派熱烈的討論。於是賴特（Erik Olin Wright）爲首的一羣新馬克思主義者便藉《政治與社會》一學誌，加以系統分析與評論（Wright 1994：447-606）。

簡單地說，羅默認爲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理想有三：（1）追求自我實現與福利的機會平等；（2）追求政治勢力的機會平等；（3）社會地位的平等（Roemer 1994b：454）。爲達此目的不僅要改善上述主要行動者的問題，還應該在未來的社會中設置兩種不同的幣制：一種是商品貨幣，提供給人民爲了購買消費品的金錢。另外一種是股票貨幣（share money），或是國庫券（coupons），是購買生產單位（公司、行號、工廠、農場、各種經濟活動單位）所有權（持分）的金錢。

這兩種不同的貨幣彼此不得兌換，也即不能把國庫券轉換成金錢。國庫券應當平均分配給國民，當然只有成人的公民才能擁有該國某一時期經濟生產財的平均國庫券持分額。有了國庫券公民可以購買生產單位所發行的股票，而享有相當的所有權，以及分享生產單位所贏取的利潤、紅利等。當然也有權參與公司行號經營政策與董事會與理事會人員的任免，股票與國庫券也不能被轉換。當公民逝世時，其擁有的股票與國庫券必須歸還國家，由國家重新分配給他人。此舉旨在阻止所有權的集中，也即富人無法向窮人購買其國庫券或其股票。

由於公司行號的股票不是以普通的貨幣（商品貨幣）來買賣，而是以國庫券來買賣，那麼公司行號的增資無法靠出賣股票來湊集；反之，金融資本的湊集是要靠國家銀行所組成的信用市場加以挹注，或靠國家的力量把國庫券轉換成商品貨幣才能達成集資的目的。國家一旦介入公司行號的增資，就無異是對市場有所計劃（*planning the market*）。其結果使市場機制能夠發揮其相當自由的功能，但又能達到財產權分配的平均，利潤分配的平均，以及發揮國家對投資優先順序的計劃能力，這便是理想的市場社會主義之主旨（Wright: 448-449）。

當然市場的社會主義之構想，不失為後共產主義時代社會主義再生的一種途徑。這是當代政治哲學思考的新方向之一，但這不排除其他對社會主義重生的設計與思考。

三、資本主義勝利的道德省思

本世紀九〇年代蘇東波的變天，以及中、越、韓三共黨國家的政策急轉彎，企圖藉經改與開放來倡導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一連串驚天動地的制度與思想之改變，不但被看作是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還被解釋為資本主義征服全球的勝利。換言之，很多世人視社會主義陣營不僅放棄計劃經濟與統

制經濟，還進一步採用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就意味著共產國家重新擁抱資本主義，從而大大地助長資本主義的聲勢與氣燄。

然則資本主義真正征服了全世界嗎？資本主義真正無孔不入、無堅不摧嗎？資本主義真是完美無缺嗎？姑不論馬克思預言資本主義必因其內在矛盾而趨於崩潰，至今尚無法兌現。但仍有許多經濟學者、經濟思想家，像本世紀中期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認為資本主義的毀滅，不在其失敗，而在於其成功。這話聽起來一方面與馬克思大異其趣，他方面似乎顯得自相矛盾，但卻有其深意在。換言之，熊氏認為資本主義的成功造成其驕奢淫侈，也為其種下毀滅的種子。

四分之一世紀前，也即一九七〇年代初，柯利士道（Irving Kristol）指出對資本主義加以頌揚的人，多半稱道這種制度所帶來的物質利益，但卻憂心只會追求成功與特權，卻破壞了以道德為支撐的經濟秩序。同一時期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1919-）也論述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資本主義所仰賴的是講求理性、實用與道德的資產階級文化，但資本主義制度卻以物質的成功取代中世紀的死水一潭，以物質主義取代傳統，以富裕取代貧窮，也以奢侈取代慎重。其結果是資本主義帶來暴發戶、巧取豪奪之人，而造成知識分子之抨擊和青少年之不滿，形成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新文化。從上面幾位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我們可知當前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挑戰並非來自經濟方面，而勿寧是道德方面（Bell 1996）。

不錯，近五十年的歷史證明世上凡是實施社會主義的國度都比實施資本主義的國度遠為貧窮和不發達，甚至連政治體制都無法實現公民自由與參政的基本人權，由此顯示資本主義對推動民主的貢獻。但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成功，以及對民主發展的貢獻，近年間卻成為跨越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與後現代主義攻擊之目標。換言之，資本主義的成功只落實在經濟方面，它在文化與道德的

基礎上卻遭人批評。這些批評的重點是擺在對資產階級社會的優勢和資產階級價值的合法性之攻擊底上面。批判的形式儘管有別，大體上是否認資本主義體制的道德基礎，堅持文化型態之不相容、或尊崇非西方（非白種）的文化傳統等等。不管批評的對象如何，當代對資本主義持極端批判態度的人都有一個一致的看法，即否認資本主義任何道德上的要求。他們認為道德是無意義的，資本主義只是一種權力、市場與財團破壞的文化，因之，資本主義是恣意放肆的、是壓迫剝削的、是腐化敗壞的（Wilson 1995: 44）。

以上是極端人士對資本主義的批評。除了激烈的左派或新左派，批評資本主義的人還包括自由主義份子。自由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的缺失為對財富分配不平無法自圓其說，更嚴重的是資本主義對生態環境粗暴的破壞。資本主義雖然帶來物質的豐盛，卻是以人類的受苦與社會的不公作為代價。

但在討論極端者與自由主義份子抨擊資本主義的同時，吾人必須進一步省思，是不是資本體制的推行所產生的結果都是壞的，都是負面的？除了資本主義制度之外的其他經濟體制會不會帶來更好、或更壞的後果？經過仔細的比較與深思之後，發現其他可行的經濟體制並不比資本主義體制來得高明。於是韋爾森（James Q. Wilson）遂指出資本主義仍有其道德基礎，值得吾人注意與反思。

亞丹·斯密早在《原富》（1776）一書中指出，儘管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很大的貧富差距，但即便是工商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窮人也比原始社會的富人生活得舒適。另一方面只有講究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才會重視環境保護者與綠黨的主張，大力維持生態的平衡而對抗環境污染。反之，像舊蘇聯黨幹官僚的作威作福、鑽求特權，反而促成貧富差距的拉大。換言之，只有資本主義的體制才會允許異議與反對聲音的存在，從而在政策上不致以少數人的孤意一擲，而違逆了多數人的意見。

作為亞丹·斯密讚賞者的馬克思，也像斯密一樣對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帶來的人類的疏離與